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双重维度

李兆元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马克思宗教批判包含双重维度。从政治维度出发, 马克思批判了海尔梅斯“宗教是国家的基础”这一观点, 指出国家是宗教的基础, 宗教随着国家的衰亡而衰亡。马克思预言了基督教国家的消亡, 人最终会以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马克思批判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观点, 提出人的解放, 通过消灭宗教的世俗基础即私有财产, 从而获得公民的普遍人权。从经济维度出发,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异化的类比, 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指出宗教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 只有消除现实世界中各种苦难, 宗教才能真正消亡。

关键词: 宗教批判; 政治批判; 劳动异化; 宗教异化

Abstract: Marx's criticism of religion contains two dimensions. From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Marx criticized Helmes' view that "relig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pointing out that the state is the foundation of religion, and religion declin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Marx predicted the demise of the Christian state, and man would eventually conceive the state in terms of free reason. Marx criticized Powell's view of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proposed that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can obtain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of citizens by eliminating private property, the secular basis of religion. Starting from the economic dimension, Marx discusses the four provisions of alienated labor through the analogy of religious alien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oot of religion lies in the real world, and only by eliminating all kinds of suffering in the real world can religion really disappear.

Key words: Religious criticism; Political criticism; Labor alienation; The religious alienation

宗教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开端, 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纵观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 我们发现: 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和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政治上, 普鲁士王国信仰基督教, 是纯粹的基督教国家, 国家为基督教服务。在经济上,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促使工人的劳动发生异化, 这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思想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它在工人中间宣扬基督教义, 要求工人服从、忍受现实的悲惨境遇, 并将“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 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下存在进行辩护”^[1]马克思围绕着这些领域, 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构成了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逻辑上的环节。全面系统考察青年马克思时期的宗教思想, 有助于我们充分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

马克思博士毕业之后, 在《莱茵报》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性文章, 这是他首次登上社会舞台, 开始了政治批判的生涯, 为今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科伦日报》第179号社论(以下简称《社论》)是他在《莱茵报》时期驳斥《科伦日报》主编海尔梅斯的一篇政论文章。马克思围绕宗教和国家, 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 得出的一系列观点, 批判了海尔梅斯的“宗教哲学”。

在《社论》中, 海尔梅斯提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 “凡是获得了较高历史意义的民族, 其人民生活的兴盛是与其宗教意识的高度发展同时发生的, 其声望和力量的衰落是与其宗教文化的衰落同时发生的。”^{[2][P212]}等观点, 马克思用严谨的科学态度驳斥了这些观点。首先, 马克思认为作为宗教原始形式的拜物教并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 反倒引起人的感性欲望, 让人误以为“无生命的东西”能够满足偶像崇拜者的欲望而随意改变其自然形式。其次, 马克思认为国家才是宗教的基础。在希腊和罗马的极盛时期, 苏格拉底、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等大多反对宗教。并且随着国家的覆灭, 这些国家的宗教随之消亡。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说:“只有把作者的论断整个颠倒过来, 才能得出真理”。

在回答“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中, 报纸应该不应该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政治?”这一问题时, 马克思明确指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并非真正的宗教国家, 它只是真正地宗教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一

个过渡性产物, 最终会用自由理性作为其原则。现代国家以自由理性为原则, 宗教国家则以信仰为根据。基督教国家并非像真正地宗教国家那样有一个“永无谬误的教会”, 它在处理人们利益的相关问题时往往将之诉诸法庭而非求助教义。在以自由理性为根据的现代国家中, 基督教国家又将宗教视作国教, 用法律来维护宗教。而这么一个过渡性国家也存在一定领域的国家和宗教分离, 就像在“最坏的国家”中也有自己的“宫廷意志”。由此, 马克思预测将来人们会用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 宗教和国家发生分离。

如果说《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持有理性国家观, 认为国家是理性的象征, 代表了人们的普遍利益。那么在遇到“物质利益难题”之后, 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对国家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家只是官僚阶级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不能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国家并不能决定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考察了完成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 发现宗教并没有因为政治解放的完成而消亡, 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国家依然存在着缺陷, 缺陷的原因是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

《论犹太人问题》是一篇驳斥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观点的文章。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放弃宗教, 基督教国家要进行政治革命, 彻底消灭宗教, 建立现代国家, 在此基础上, 犹太人才能和基督徒放下宗教偏见, 共同获得解放。马克思在考察了法国和北美国家后发现, 即使是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 宗教依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宗教是有缺陷的定在”, 这个实在的缺陷与国家的概念发生了矛盾, 矛盾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宗教虽然被驱逐出了政治领域, 但在市民社会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在黑格尔那里, 市民社会是每个人实现个人特殊性原则的地方, 是满足个人需要的领域, 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是原子式的个人。马克思将原子式的个人看作世俗领域的教徒, 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利己主义的教徒, 市民社会成了教徒实现自身价值的领域, “实际需要, 利己主义”的宗教精神成为了市民社会的原则, 市民社会的发展带动了宗教的发展。市民社会中的宗教代替了等级制度对国家的认同, 私人利益压倒了公共利益, 国家成了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由此, 马克思认定, 政治解放并没有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使人获得普遍的人

权。要想实现这一解放,必须进行人的解放,消灭市民社会的基础即私有财产,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一旦私有财产被消灭,宗教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自行消失。

二、宗教异化和劳动异化

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在经历政治上地反动和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思潮地冲击,普鲁士王国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巨变的世界。当“自我意识”依旧在思辨的窠臼内打转时,费尔巴哈历史地承担了这个使命。首先,他推翻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指出,黑格尔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当作从属的东西抛在一边。”^{[3](P360-361)}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颠倒了自然和思维的关系,费尔巴哈评价黑格尔是一个头脚倒置的人。其次,费尔巴哈建立了人本学,他指出:“人有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认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即使是离人最远的对象,只要确是人的对象,也就因此而成了人的本质之现实。”^{[4](P37)}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人本学的创立使得费尔巴哈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时我们都是费尔巴哈派”。

在宗教领域,费尔巴哈得出来人本主义宗教观。“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意识。”宗教的本质及意识是人的本质及意识,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上帝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上帝一切美好的品质只不过是让人让渡给上帝,因而“宗教并没有独自の、特殊的内容。”人在奉献给自身一切美好品质时,自身就堕落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就本质而言,上帝越是属人,则他跟人的区别就似乎越大,也就是说,属神的本质跟属人的本质之同一性、同一性就越是为对宗教的反思、为神学所否认,而属人的东西就越是被贬黜。”^{[4](P63-64)}为了使上帝善,人就必须恶,上帝需要什么,人就必须失去什么,也就是说,“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人留下的就越少。”

费尔巴哈将宗教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打破了天国的幻想,让人能“以理性的名义去思考和批判历史的非理性”,并将人们的眼光重新聚焦在现实的人身上。然而费尔巴哈到这里便停滞不前,没有进一步指出人的解放,只是提出“爱的宗教”来调和人与宗教的尖锐矛盾。虽然费尔巴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他的思想。费尔巴哈将天国的幻想拉回到尘世的现实,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阐述了劳动异化和宗教异化逻辑的一致性。正如牛苏林所讲,“如果说费尔巴哈把幻想的天国还原为现实的尘世,那么,马克思却要从现实的尘世去说明天国的幻想。”^{[5](P73)}马克思指明了消灭宗教的道路在于在现实世界消灭宗教产生的根源即人民的苦难生活。

宗教异化到经济异化的发展脉络,从根本上仍然属于同一思考范式,其本质是相同的。^[6]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的思想逻辑将之运用于劳动异化,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通过对宗教异化的类比,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第一是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7](P48)}工人制造的劳动产品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

反对自身的力量就越强大,劳动产品就越不属于工人。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异己的对象,但这个异己的对象反过头来却统治了人,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自身就越贫乏。第二是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工人的本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实否定自己,因为这种劳动属于别人并不属于他自己。正如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7](P60)}第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所谓的类本质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类本质是区别于动物的人所特有的东西即意识。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概念进一步引申并运用于劳动领域,提出了“类生活”的概念。类生活是生产生命的生活,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P63)}人只有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在资本主义资产方式之下,工人的工作不再是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而是其维持生活的手段,丧失了人的本质。第四是人同人相异化。当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时,人与人发生了异化,资本家实现了对工人的统治。正如“世俗人对僧侣或者世俗人对耶稣基督的关系”,当僧侣成了上帝的代言人,便实现了对世俗人的统治。

由于欧洲国家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批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宗教批判。在二者的进行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国家是宗教的基础,并且国家只是维护个人物质利益的工具,因而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在于人民苦难的现实生活,由此马克思进入“此岸世界”,即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马克思在对“劳动”进行反思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劳动与宗教一样发生了异化,通过对宗教的类比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马克思通过对这两个维度批判为唯物史观的建立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戴维·麦克莱伦,平川.马克思论宗教[J].国外理论动态,2015(03):56-64.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4]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 [5]牛苏林.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6]郝瑞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宗教异化思想[J].理论探讨,2008(01):47-49.
-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